



（上接1版）

你看，“玛雅人的金字塔”拉近了墨西哥民众的感情，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让美国民众倍感亲切，“三个中哈友谊故事”使哈萨克斯坦人民永远记住了这次演讲。谈发展道路，他说“鞋子合不合脚，只有穿鞋子的人自己才知道”；谈东西方文明，他说“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，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，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”；反驳中国威胁论，他说“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，但这是一只和平的、可亲的、文明的狮子”；谈解决全球性问题，他说“如果我们能为这个世界打造一把精巧的瑞士军刀就好了”。访问美国时，他专程到27年前结交的美国老朋友家，在炉火旁促膝长谈、茶歇叙旧；访问德国时，他借用“牛顿力学三定律”，向物理学博士出身的默克尔阐释对发展中德关系的看法；访问爱尔兰时，喜爱足球的他在球场上展示了“令人钦佩”的“一脚远射”，这些都被媒体形容为“极好地传达了亲和的形象”。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因为习近平总书记，对今天的中国充满兴趣。他成功展示给世界的，不仅是他个人的风范与气度，更是中国的形象与魅力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评价他为“中国新一轮革新的中心

人物，全球最有影响力人物之一”。俄罗斯总统普京赞誉“习主席提供了榜样的力量”。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说，“看世界领导人，最佩服的就是习近平主席”。

有一种初心人民为本—— 习近平总书记是在人民群众中 成长起来的我党领袖

习近平总书记从小就有农村情结，他说“我的爷爷也是农民，我的父亲是从农民走上革命道路的，我自己也去当了七年的农民。”“我就是从贫困窝里走出来的。”毛主席在延安称赞习仲勋是“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”，陕北老乡称赞习近平总书记是“贫下中农的好书记”“吃苦耐劳的好后生”。

习近平总书记离开梁家河的那天早晨，他住的那个院子里，天不亮就站满了前来送行的乡亲们，都是自发来的。当他真要走时，人群中哭声一片，全村老老少少依依不舍、送了一程又一程，最后有13个人步行60多华里一直送到延川县城，并凑钱照了合影。10年后，习近平总书记向《中国青年》杂志记者讲述当时的场景时仍激动不已。他说：“那天，望着送行的乡亲们，我喉头哽

咽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7年啊，我多少次欲哭无泪，离开时我第一次哭了。陕北的人民养育了我，保护了我。我虽然告别了陕北的父老兄弟，但再也离不开人民。”2015年2月春节前夕，已是党的总书记的他首次重回梁家河，见到当年一起生活、战斗过的乡亲们，又一次动情地说：“当年，我人走了，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。”可以说，习近平总书记最初对“人民”二字的体悟，就来自梁家河，来自那些让他始终魂牵梦萦的陕北乡亲。后来在浙江，他以“哲欣”为笔名在《浙江日报》开辟“之江新语”，撰写了232篇短论，回应的都是人民群众关切的问题，“用大白话，谈大事情”，被网友誉为“中国第一博主”。在浙江工作的5年，他“跑遍了浙江的山山水水，也跑深了与浙江广大干部群众的真切感情”。谈到这个问题，习近平总书记说：“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，当地（市）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，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。”“要始终与人民心在一起、苦在一起、干在一起”“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”。

这种朴素的情感穿越了近半个世纪。十八大后，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伊始就庄严宣示：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就是我们的

奋斗目标”。无论是庆丰包子铺与市民一起排队就餐，还是雾霾天里在南锣鼓巷与老街坊亲切交谈；无论是在兰州养老餐厅给老人端菜送饭，还是到河北阜平在农民炕上盘腿而坐，那种与民相亲、与民同乐的情感由内而发、纯朴自然。用老百姓的话说，就是“总书记到家来，就跟亲戚串门、邻居唠嗑一样，没有一点架子，特别亲切。”

2013年11月到湖南调研时，他一下飞机就直奔湘西最贫困的十八洞村，盘山公路走了几个小时，又翻了几座山。村里一个老太太问习近平总书记，“请问你贵姓，你是哪里来的？”因为地方偏僻，老太太又不看电视，不认识总书记。后来，全村人都围了上来，一看基本上都是老人、儿童和妇女。怎么扶贫呢？总书记就坐下来和大家拉家常、找办法，最后说：给你们搞“几条腿”来吧，一户养几头黑猪、一头黄牛，再养几只山羊。老太太、老大爷听了很高兴，说“对对对，就要这个”。今年6月21日，总书记专程前往山西吕梁山区的深度贫困村赵家洼村，他深入田间地头，走村串户，掀锅盖，上井台，坐炕沿，发现这里生存条件恶劣、生态环境脆弱，是典型的“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”，是脱贫攻坚的贫中之贫、坚中之坚。总书记开出药方：易地搬迁，挪穷窝、

拔穷根，彻底解决。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的扶贫要精、要准，要因地制宜、因人施策、因人施策，“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”。按照这个思路，一场轰轰烈烈的“脱贫攻坚战”全面打响。从2013年至今，有近6000万人口摆脱贫困，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口总数。到2020年，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将全部脱贫，实现全面小康。这对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国共产党人来说，不仅仅是一个目标、一份承诺，更是一片饮水思源的决心、一个矢志不渝的决心、一颗志在必得的雄心。这是最深的牵挂，也是最大的担当。

归结起来说，习近平总书记这个党中央的核心、全党的核心，是在红色基因传承中成长起来的，是在艰难曲折困境中磨砺出来的，是在复杂国际斗争中历练起来的，是在极其丰富的革命实践中确立起来的，这个核心在共产党员和亿万人民群众中是最“走心”的，真正是众望所归、人心所向。万山磅礴必有主峰，龙蛰九章必有一领。我们一定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，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，以更加昂扬的斗志、更加扎实的举措更好履行自己的职责，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。

消除贫困、改善民生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，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，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。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大任务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谋划、统筹推进脱贫攻坚工作，着力打赢脱贫攻坚战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。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，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医疗等公共服务条件显著改善，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，干部群众的精神风貌焕然一新。过去4年间，我国贫困发生率下降了5.7个百分点，由2012年底的10.2%下降到2016年底的4.5%；每年都有1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走上致富路，4年累计脱贫5564万人。在充分看到脱贫攻坚取得的显著成效时，更要清醒地认识到脱贫攻坚的难度。还没有脱贫的大都是贫困程度深、基础弱、条件差的地区和群众。要做到一个也不能掉队，就必须坚持把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作为脱贫攻坚的重点，拿出管用有效的硬措施硬办法，确保在既定时间节点完成脱贫攻坚任务。

着力抓好贫困户和贫困人口的精准脱贫。精准掌握动态的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基础信息，通过建档立卡摸清贫困人口底数，并实现信息的动态调整。提高扶贫措施的精准性和有效性，在切实掌握致贫原因的基础上因人因户因村施策，针对性措施和办法实现脱贫。对有劳动能力而就业不足的贫困家庭，着力提高劳动技能培训的针对性，提高扶贫小额信贷、扶贫贷款等政策的精准性，扶持发展种植业、养殖业，鼓励贫困人口就地就近就业，促进贫困人口转移就业。对因病致贫的贫困家庭，重在落实好教育扶贫政策，对贫困家庭的中小学生学习全部免除杂费、书本费，加大对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帮扶力度，发展贫困地区学前教育，解决贫困家庭学生上学难题。对因病致贫的贫困家庭，提高新农合医药费报销比例，推进大病医疗保险全覆盖，提高贫困地区医疗服务能力，解决因病致贫、因病返贫的问题。对收入只够温饱、无力解决住房难题的贫困家庭，加快推进贫困地区农村危房改造工作，力争在整县脱贫之前实现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。对那些已经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，要全部纳入农村低保，确保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。

着力抓好贫困村和贫困乡的精准脱贫。目前看，建档立卡不能仅仅局限贫困户和贫困人口，对贫困发生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贫困村、贫困乡、贫困县也要建档立卡，分门别类找准贫困发生率偏高的突出原因，因地制宜制定脱贫攻坚措施。对一方水土难以养活一方人的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乡村，要在坚持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，确保在“十三五”期间搬迁1000万左右贫困人口，大力发展扶贫产业，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、稳得住、有业可就、逐步能致富。对自然条件尚好、产业发展不足的贫困乡村，要突出产业扶贫，实施贫困村“一村一品”产业推进行动，培育能够带动贫困人口脱贫的经济实体。对贫困发生率偏高的乡村，加大国家扶持“三农”的政策、资金和项目的倾斜支持，在交通、水利、金融、教育、健康等方面综合施策，以精准帮扶促进贫困地区民生改善。

着力增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发展能力。必须看到，对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，单靠进村入户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这就需要依靠国

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

□熊若愚

家的力量从根本上改变特困地区的面貌。在集中连片的特困地区，建设一批交通、水利、电力、信息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，确保农村饮水安全，实现电力、宽带等村村通。加快实施一批重大生态工程，对25度以上陡坡耕地全面退耕还林还草，健全完善生态补偿机制，提高生态补偿标准。加快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城镇化步伐，让符合条件的贫困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及其家属落户，发挥好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对脱贫的辐射带动作用。加大中央财政对贫困地区转移支付力度，增加专项扶贫资金规模，通过税收优惠、贴息支持、财政奖补等机制，引导资金、土地、人才、技术、管理等各种要素向贫困地区聚集，形成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。

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基层基础工作。强化扶贫开发工作领导责任制，落实扶贫开发工作管理体制、工作机制和工作责任制。坚持把扶贫开发同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，深入推进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工作，选好配强贫困村两委班子，鼓励和选派优秀年轻干部、退伍军人、高校毕业生到贫困村工作，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，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的战斗堡垒作用。充实一线扶贫工作队伍，发挥贫困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作用，做到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工作队、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。

把握好脱贫攻坚正确方向。坚持扶真贫、真扶贫，真正围绕群众脱贫出实招，坚持量力而行、真实可靠、保证质量，防止层层加码，防止形式主义的扶贫，不建形象工程的样板。开展督查巡查，实施最严格的考核评估，努力做到扶贫工作实，脱贫过程扎实，脱贫结果真实。注重把贫困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，把扶贫同扶志、扶智结合起来，引导贫困群众发扬自力更生精神，增强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，努力靠艰苦奋斗甩掉贫困、改变命运。

消解地方债对深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约

□陈 龙

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深化阶段，而地方债成为制约其深化的重要因素，不仅积聚了财政金融风险，而且产生较强的“挤出效应”——挤压了其他市场主体的“资源空间”和财政政策的“操作空间”。消解地方债对深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约，需要疏堵结合，既要强化流量管理，更应着眼于存量调整，并从根源上解决这一问题。

警惕当前地方债“隐形化”和 复杂化加剧趋势

近年来，为加强地方债管理，我国出台了包括实行地方债限额、分类纳入预算、剥离融资平台政府融资功能、建立债务风险评估、预警和应急处置等措施，逐渐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地方债管理和监督机制。同时，我国实行了债务置换，2015—2017年的置换额度分别为32万、5万和3万亿元。有关数据的显示，截至2016年末，我国地方政府债务15.32万亿元，地方政府债务率为80.5%。通过健全机制、强化监管和债务置换，进一步提升了地方债管理的规范性，降低了地方债务成本。

尽管中央采取诸多“高压”措施强化管理，但由于地方融资的冲动、压力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，地方融资和地方债出现了新变化、新问题。主要表现在：其一，在中央及相关部门的三令五申下，政府名义上的担保得到有效遏制，但以默许或私下承诺等方式出现的变相担保问题，致使地方债务更加“隐形化”；其二，作为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而出现PPP、政府购买服务和投资基金等，对稳定经济、推进地方建设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发挥了积极作用，但也出现了超越使用条件和范围、假借其名搞变相融资等异化现象，积聚了新的财政金融风险；其三，在剥离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功能之后，于是一些地方政府便通过其他单位和企业以其他方式融资，而有的融资平台从金融机构融资的能力受到削弱之后，则通过表外业务、“影子银行”等渠道“找资金”，有的地方甚至出现相互拆借资金、“三角债”等现象，使债务问题更为复杂，其风险传导性更强；其四，受财政收入增幅下降影响，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尖锐，以工资发放、社保支付等“消耗性”支出而产生的债务问题日益突出，这与以往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“建设性”融资相比，风险也更大。

地方债“隐形化”和复杂化加剧趋势，从表面上看是由于现有的“开前门”的融资方式并没有满足地方融资需求，特别是在财政收入增幅放缓的情况下，一些地方为防止工资、社会保障等方面“断坎”或推动市政建设，另辟“融资蹊径”，力图绕开中央的“监管禁区”。但其根源在于政府与市场、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没有根本理顺，政府转型尚未完全完成，相关改革、机制的协调性和系统性有待于增强。

地方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制约不只体现在金融风险方面

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，虽然经济“筑底”

趋势日益明显，但根本性矛盾，特别是重大结构失衡问题尚未完全解决，对未来经济持续增长带来了压力。优化资源配置，着力化解结构性失衡，释放经济潜力和活力，培育新的竞争优势，则应成为深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。我国15.32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务，加上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2.01万亿元，我国政府债务达到27.33万亿元，政府债务负债率（债务余额/GDP）为36.7%。虽然这一指标低于60%的欧盟警戒线，债务风险总体可控，但政府债务中的结构性问题，特别是地方债对深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约不容忽视。

一是积累了引发局部系统性风险和突发性财政金融风险的潜在因素，给深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需的稳定环境带来压力。虽然我国政府拥有庞大的公共资源以及具有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，处理 and 应对债务风险的能力也较强，但地方债积累的局部系统性风险和突发性财政金融风险仍不容忽视。地方债务快速膨胀和融资不规范，PPP、政府购买服务和投资基金出现的异化现象，特别是当前地方债“隐形化”和复杂化加剧趋势，使一些债务通过“黑箱”或“暗箱”形成并运转，增加了债务监管的难度，加大了债务风险的传染和冲击效应。

二是巨额的债务存量呈现出较大的“挤出效应”——挤压了其他市场主体的“资源空间”。虽然我国实施了大规模的地方债务置换，将债务成本从平均10%左右降至3.5%左右，减轻了地方负担，但这只是将债务压力后移，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当前，地方债和一些效率较低的企业占据大量的优质金融资源，是造成诸多结构性失衡的主要因素。截至2016年底，仅财政部认可的地方债就已占到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106.6万亿元的14%，挤压了其他市场主体的贷款额度，制约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。

三是挤压了积极财政政策的“操作空间”。依据宏观经济形势的新变化，今后一段时期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由“数量对冲型”为主的政策取向，转向“结构调整型”为主的政策取向，在短期对冲经济下行力量的同时，着力解决制约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的深层因素。但巨额的存量地方债，已成为财政政策的羁绊，挤压了政策操作空间，影响了赤字、减税以及支出政策的调整和优化。当前政府债务的主要风险不在于总量，而在于结构，只有处理好地方债问题，才能使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效。

疏堵结合，解决根源性问题， 消解地方债的制约因素

当前，消解地方债的制约因素，需要疏堵结合：一方面，针对地方债“隐形化”和复杂化加剧的趋势，增强“堵”的效果；另一方面，削减地方债务存量，解决根源性问题，以“疏”消除地方债的深层制约。

建立省级资源统筹和改革协调机制，削减存量债务，促进融资平台转型。未来地方债管理中需要破解两大关键问题：一要削减债务存量，盘活经济、增强企业发展能力；二要实现融资平台转型，建立健康、可持续的地方融资机制。破解这两个问题，需要做好资源全局优

